

正德朝邑县志的版本问题

冯宝琳

正德朝邑县志，明王道修，韩邦靖纂。全书二卷，共分七篇。上卷四篇，曰总志、风俗、物产、田赋；下卷三篇，曰名宦、人物、杂记。

韩邦靖字汝庆，号五泉，朝邑县人。明弘治二年生，嘉靖二年卒（公元1489—1523年）。十四岁中举，正德三年与兄韩邦奇同第进士。历官工部主事、员外郎。他敢于指斥朝政，上疏直言，因此被夺职为民。这部朝邑县志就是他罢官家居时所纂著。嘉靖元年复被起用，二年病逝，年仅三十五岁。其事迹见《明史·韩邦奇传》。

韩邦靖朝邑县志以简洁见长，一变明初方志繁冗之体，形成了编纂地方志的新风格。全书虽不足七千字，却全面、概括地叙述了朝邑县从三代殷周到明正德时的建置沿革、山川地理、风俗、物产、历代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等等。资料丰富，剪裁有方，文笔简洁恬雅，从容流畅。

由于朝邑韩志是有明一代关中著名的志书，所以进行刊刻、重印、翻刻、重刻及补版重印者甚多。在明清两代的众多版本中，刻本有明正德十四年（己卯，公元1519年）初刻本、明万历四十年（1612）刻本、清翻刻明万历本、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王兆鳌刻本、清乾隆四十年（1775）海盐杨志梁刻本、清嘉庆元年（1796）是政堂刻本、清嘉庆七年（1802）谢正原刻本、清道光四年

(1824) 南海叶梦龙喜闻过斋刻本、清道光九年(1829) 定安莫氏刻本、清道光十五年(1835) 山阴汪能肃刻本、清咸丰六年(1856) 番禺陈氏古香书屋刻本、清同治十三年(1874) 合肥唐定奎彭城刻《正德武功、朝邑县志》本、清光绪九年(1883) 三原李氏刻《桐荫轩丛书》本、清光绪间刻《安乐延年室丛书》本、清同义文会刻本等等。抄本有明抄本、清乾隆间抄《四库全书》本、清侯官郑杰抄本、清南海孔氏嶽雪楼抄本、清宝元室抄本、清陆恩黻借抄居抄本等等。此外, 还有常见的《逊敏堂丛书》本、《三长物斋丛书》本、《得月簃丛书》本及《小石山房丛书》本等等。迄今已知的计有刻本22种, 抄本15种, 共计有37种版本之多。可以归纳为: 二卷本、七篇本及一卷本三种不同的分卷形式。即明正德十四年刻二卷本的版本系统, 现有刻本13种、抄本9种; 清道光四年南海叶梦龙喜闻过斋刻七篇本的版本系统, 现有刻本3种、抄本2种; 清乾隆四十年王元启校订一卷本的版本系统, 现有刻本6种、抄本4种。其中以明正德十四年二卷本系统的版本问题为最多。现将自己多年来对正德《朝邑县志》的版本进行探索核实的一些体会, 小记于下:

一、明正德十四年初刻本

正德初刻本《朝邑县志》极为罕见, 各家书目很少著录。宁波天一阁明范钦司马收藏明代方志为数颇多, 但是没有入藏此正德十四年刻《朝邑县志》。嘉靖去正德不远, 足见在当时已经是罕见稀有的了。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六史部也仅仅著录了“韩邦靖朝邑县志二卷”九个字, 而未言及修志年代。《明史·艺文志》更是失收。《四库全书总目》仅著录所据系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清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也无此正德初刻本。清莫友芝《邵亭知见传本书目》所著录的朝邑韩志, 仅有道光四年南海叶梦龙刻本及《得月簃丛书》本两种而已。可以说

《朝邑县志》的正德初刻本在明清两代已是极为罕见的了。

现存的明正德十四年（1519）初刻本仅有一部，收藏于湖南省图书馆。此书的行款为半页八行，行十六字，小字双行，黑口，四周双边，双鱼尾。版心二鱼尾间刻书名，鱼尾下镌页码。版式框高15.3厘米，宽11厘米。康海序、韩邦靖自序、吕柟后序及王道跋的行款也全都是八行十六字，均为楷体字。全书次第是：康海序，韩自序，目录，上卷四篇，下卷三篇，吕柟后序，最后是王道跋。此书字体古朴厚重，具有弘治、正德朝的时代风格，白绵纸稍有水渍，古色古香，刻印俱佳。

此书原是湖南道州何氏旧藏，长沙叶启勋从书商处购得。叶启勋字定侯，号更生，湖南长沙人，系郎园叶德辉之侄。幼承家学，喜蓄书，多秘本，室名拾经楼。在二三十年代曾发表《拾经楼群籍题识》及《四库全书目录版本考》等著作。此正德初刻本钤有许多收藏印章。叶氏钤有：“叶氏启勋读过”、“叶氏定侯紬书”、“拾经楼丁卯以后所得”、“拾经楼著录”等朱文方章，并且题写长跋叙述得书经过。书上还钤有其弟叶启发的藏书章：“东明审定”、“东明鉴藏”、“叶启发藏”和“华鄂堂著录”等。查叶启发为其十弟，又名叶肅，字东明，自称叶十，也写有戊寅（1938）得此书的题记。这个正德初刻本可能已由叶启勋的拾经楼转归到叶启发的华鄂堂中了。

明正德初刻本的刊刻特点有六：（一）书上康、韩、吕、王四篇序跋全都是楷体字，这是与后来的重刻本上的序跋书法是迥然不同的。（二）正德初刻本有许多古体字，如第一页即有：殷、臨、属等字，这是二卷本系统的特点，后来的重刻本也几乎都有许多古体字。（三）在正文最末，与“朝邑县志卷二终”并列的另一行，有“生员王勋查录”六字，二卷本系统的许多重刻本基本上都有此六字。（四）正德初刻本全书有二墨钉，均在卷一页六下第八行“长可二十里，多莲□开花烂然映云日，□……。”查第

年月题记。卷端、书口及目录均题为朝邑县志，但书签却题名为五泉县志，盖以同时刊刻的诗集、志传等全都是以“五泉”题书签，因而也就在朝邑县志的书签上题为五泉县志了。卷前有康海序4页，韩邦靖自序2页，目录1页，卷之一为7页，卷之二为10页；卷后吕柟后序2页，王道跋2页。康、韩、吕、王四篇序跋的书法与行款，被以后的重刻本视为范本，全都按照万历本的版式刊刻。二卷本系统的众多刻本虽然版刻年代不同，但基本上全都是这个模式。万历本的字体具有浓郁的万历年时代风格，刻工刀法较好。此书古体字也很多。卷二末也有“生员王勋查录”六字，与“朝邑县志卷二终”并列，这说明万历本源出于正德十四年初刻本。但是，万历本在卷一页七下“畸零”二字不全，“畸”下为墨钉，这一点与正德初刻本“畸零”二字全，“畸”下无墨钉，是不相同的。明万历刻本之易被误认为是正德初刻本，一是书上无题记，只有序跋上题的“正德己卯”；二是字体有明代风格。如果仔细审视，万历刻本与正德刻本的区别还是可以分辨出来的。

（二）清嘉庆七年谢正原刻本 这个本子是据明万历四十年刻本进行重刻的，行款字数全同于万历本，鱼尾上下所刻书名、卷数等亦与之全同。康、韩、吕、王四篇序跋的书法及行款，亦均与万历本相同。附刻的《韩五泉诗集》四卷，在卷前除有渭南刘凤池刻诗集序及康海序之外，还有邑人谢正原嘉庆七年重刻韩五泉诗集序。但是，在《朝邑县志》部分没有重刻题记，也是仅有康海、吕柟等四人序跋所题的“正德己卯”。此书所用纸张很像绵纸，若仔细审视又近于皮纸，如果不是与《韩五泉诗集》及《韩安人遗诗》合函在一起，而仅仅只是一册《朝邑县志》的话，由于没有刻书年及重刻题记，稍一疏忽就可能被误认为是正德刻本。书上的古体字与万历本相同，卷二末也有“生员王勋查阅”六字。但在卷一页七下“畸零”二字全，无墨钉，这一点则

一个墨钉无字，第二个墨钉应是“池”字。在卷一田赋第四“畸零”二字全，“畸”下无墨钉，这是与二卷本系统的万历等重刻本的显著不同的地方，那些本子“畸零”二字不全，“零”字为墨钉。但也有极个别的本子“畸零”二字全，只是为数极少。（五）虽然是初刻本，但边栏断版裂纹甚多，说明此书是后印本，不是初刻初印本。个别版页字体稍差，盖朝邑地处西北，好刻工、写手不多，其字体实具有正德的时代风格，不是后来的补版。（六）在卷二页十一第六行“而善崩溢辍没禾稼，崩乃数十年不得田”。中的“辍”字在后来的重刻本之卷二第八页上第五行第九字，明万历、清康熙等重刻本也全都是“辍”字，在康熙以后的重刻本上，有的作“輶”，有的作“輶”，还有的作“轍”、“轍”的。这个“辍”字的变化是辨别重刻本时间先后的关键字。

二、其它被误认为是正德己卯本之版本情况

笔者曾见到二十多部著录明正德十四年（己卯）刻本的朝邑县志卡片，但实际上明正德初刻本不可能有这样多。联想到韩邦靖是陕西著名文人，《朝邑县志》是关中著名方志，明清以来慕名而进行刊刻、重印、翻刻、重刻和补版重刷的情况很多，而正德初刻本又传世很少，关于这个本子究竟是什么样子，竟然形成了无从查考的局面，所以很容易鱼目混珠，误将晚出的本子当作为初刻本。更加以书上大多没有重印者、翻刻者、重刻者和补刻者的年月题记，仅有吕柟、康海和韩邦靖的序及知县王道的跋，他们均题为正德己卯（十四年），因而容易引起在编目时的错觉，产生根据序题年而误写为正德十四年（己卯）刻本的情况，造成了版本著录的混乱。现将几部容易被误认是正德初刻本的关键本子介绍如下：

（一）明万历四十年刻本 这是韩邦靖内侄孙屈受善为刻韩安人遗诗而附刻的。在此书《朝邑县志》册中无跋语，亦无刻书

与正德初刻本相同。嘉庆七年本刊刻所据的底本，或者不仅是明万历本，而且参阅了其它本子。

（三）清同义文会刻本 此本的行款与明万历本、清嘉庆七年本相同，康、韩、吕、王的序跋书法也都与以上两个本子相同。卷端、书口题的书名是“朝邑县志”，书签上有的题为“五泉县志”，有的题为“韩五泉朝邑县志”。此本字体甚劣，纸是毛边纸，最明显的是书签不是写刻的而是石印的，说明此本的书签年代只能是晚清末季了。扉页大题“朝邑县志”，右上角“韩五泉先生著”，左下角“同义文会藏版”。查同义文会曾在光绪七年刊刻清李元春纂修的《咸丰初朝邑县志》及《朝邑县志例》。在《朝邑县志例》的书签上，还钤有“朝邑同义文会”朱文小印章，这与一般县衙藏版的尊经阁、文昌阁及明伦堂等等是不相同的，因为不可能上溯到三百五十年前，在明正德时就有此文会的。本来在扉页上题写的很清楚，但是有的书在装订时没有装此扉页；有的是被旧社会的个别书商撕去了扉页及书签，企图鱼目混珠，藉以抬高书的身价。由于书上没有刻书题记，只有序跋上的题年，若是仅依据序题年而忽略了刻书的字体及纸张特点，那就容易搞错了。清同义文会刻本的特征是：（1）“弘”字避讳作“宏”；（2）卷二末没有“生员王勋查录”六个字；（3）在卷二页八上第五页第九字“辍”已刻为“辄”；（4）在卷二页八上的栏框上有断版裂纹三处。

三、关于清康熙五十一年王兆鳌刻本

清康熙五十一年重刻的《朝邑县志》的现存部数甚夥。它们的字数、行款虽然相同（全都是半页九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单鱼尾），但板框有的是四周单边，有的是左右双边。书的字体刀法，有的尚佳，带有康熙时字体瘦长的笔姿，有的字体则甚差。通过比较、查核几部康熙五十一年刻本，感到有一些可疑地

方。王兆鳌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续朝邑县志》序称：“今夏延邑诸君子纂成后志，并韩、王两刻统付剞劂，共汇一裒……。”这说明王兆鳌在刻康熙《朝邑县后志》时，将韩邦靖正德《朝邑县志》及王学谟万历《续朝邑县志》也进行了重刻。王兆鳌所刻的朝邑韩志，现存的部数很多，而版本不一样的也多。白绵纸本“弘”字不避讳，竹纸本则均避作“宏”，这说明此书刷印的时间先后是不相同的。清嘉庆元年，张我华在《校刊朝邑县志书后》曾提到正德朝邑县志版刻之讹，有以“辘”为“轳”的，足见在乾隆时已经有误刻为“轳”字的了。可以说：凡“弘”字不避讳，“辘”字未改的本子是清康熙五十一年原本；若“弘”避作“宏”，辘作为“轳”的则是乾嘉之际后印的本子；若“辘”作为“輶”字，则时间又稍晚了；至于作“轳”或“轳”的，则为时更晚了。也可以说此康熙五十一年刻本是屡经递修补版重印的，像“轳”、“轳”字刻的极劣，很可能是用木活字挖贴的了。还有的本子，虽然“弘”字不避，“辘”字未改，似乎应该是康熙刻本，但有的版页字体实在不像，说它不是康熙时刻的，又没有否定它的充分佐证，如果说这些版页是后来补版重刻的，在版页上又没有补刻的标记。由于书上没有补版者的题记，也就无法去探求补版重刻重印的时间。所以，在清康熙五十一年王兆鳌刻本的众多复本中，还存在一些无法确定、不好解释的问题。

四、朝邑韩志重刻本中的佳槧及稀有本

（一）清道光四年南海叶梦龙喜闻过斋刻本 此书行款为：半页十行，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在首页下端有刻印“河间纪晓岚氏校本”长方章，盖源出于纪昀家藏本。全书七篇，不分卷。书前冠以康海序、韩邦靖自序。书后有吕情后序，而未知县王道跋。有清嘉庆二十年宁化伊秉绶跋及道光四年叶梦龙题识。伊秉绶跋云：“明志推武功、朝邑，而朝邑罕传本。

乾隆丙午（五十一年），予馆河间纪文达师，时师方编纂四库书提要，授此本曰：‘此志义法简古，本太史公，善藏之。五泉韩子他无表见，而序之者康对山，高陵吕氏为后序，皆君子人也。’丙午距今三纪，吾友南海叶云谷农部好古，乃归之，冀刻行焉。嘉庆二十年三月十二日，宁化伊秉绶跋。”叶梦龙题识云：“右朝邑县志一卷，为相国纪文达公校定本。故人伊墨卿太守手抄见遗，藏之已十年矣。去春校毕《广东通志》，因出而刊行之。是书明以来推为绝作，固不可不传，而故友拳拳之心尤不可没也。道光四年夏五鐫既成，南海叶梦龙并识于卷末。”伊跋所称“明志推武功，朝邑，而朝邑罕传本”，可见在乾嘉时，朝邑韩志已是比较罕见难得的了。

此书刻工甚佳，字体略长，酷似清康熙时鐫刻，纸墨精致，堪称佳槧。若无伊、叶二跋及书尾刻印之“道光甲申（四年）二月，雕于广州喜闻过斋”牌记，很容易误认是清初刻本。

（二）清道光九年定安莫氏刻本 此书亦源出纪昀家藏本。行款为半页九行，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全书七篇，不分卷。书上无古体字，“畸零”二字全，“弘”避作“宏”，“辍”作“輒”。书前冠以四库提要的有关引文，然后是康海序，韩邦靖自序，书后为吕柟后序及莫瑞堂跋，亦无知县王道的跋。莫瑞堂跋称：“余十五六岁时，闻有此志，遍求不得，嘉庆壬戌（七年）入都，始从《四库全书》中录出。秘藏多年，雕镂行世，天下之宝与天下共之而已。道光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定安莫瑞堂书农跋”。此定安莫氏刻本，迄今所见仅北师大图书馆藏有一部，稀有可贵。

（三）清光绪九年三原李氏刻《桐荫轩丛书》本 全书无序跋，共二卷。卷前仅刊目录1页，卷一7页，卷二10页。行款为：半页九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此书系巾箱小册，板框狭长，字体较小，鐫刻清晰。书中古体字均与其

它二卷本同，卷二末亦有“生员王勛查录”六字。查《中国丛书综录》未著录此丛书，不知为何人所辑。全国仅有此一部，是陕西省图书馆所藏，堪称稀有，颇可贵也。

五、王元启校订的《校正朝邑志》一卷本

明正德朝邑县志的一卷本是清王元启校订的，书名为《校正朝邑志》。清乾隆三十七年（壬辰）王元启应东昌府知府胡德琳之请，进行校订朝邑韩志。王序云：“……余特爱其繁简之际，去取有方。质以己意，其所不合者十二三，因稍为核正，命儿子尚珏录而藏之……。”胡德琳序称：经王氏校订“芟繁补缺，纠驳讹舛，一一过其原书远甚。”当然，这不过是胡的颂誉之词而已。王、胡二序在《校正朝邑志》各种本子中均有载录。由于王元启根据他自己的观点，对不合其意的十之二三进行了校订，这个校订本就掺杂了王氏的行文笔法和他个人的见解，因而，就不是韩邦靖朝邑县志的本来面目了。所以，清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认为王元启的校订是“臆改不佳”，此四字评语颇为中肯。王元启校订伪《校正朝邑志》一卷本共有六个刻本，以《惺斋先生杂著》本和番禺陈氏古香书屋本较为少见。另有四种抄本，则是道光二十五年陆恩黻借抄居抄本，同治十三年刘履芬抄本，光绪十年吴江柳兆薰抄本及清抄本。

作者原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